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PERILOUS FRONTIER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美〕巴菲尔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PERILOUS FRONTIER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美〕巴菲尔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 [美] 巴菲尔德(Barfield, T.) 著；袁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7124-8

I. ①危… II. ①巴…②袁… III. ①边疆地区—少数

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722 号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opyright © 1992 by Thomas Barfiel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Barfiel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286

-
- 书 名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著 者 [美]巴菲尔德
译 者 袁 剑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装帧设计 陈 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3.625 插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124-8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中国的边疆属于中国，但中国的边疆研究却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不仅在于中国自身的悠久历史与文明型塑了中国边疆璀璨多姿的风采，而且也在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占据的日渐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边疆研究更应该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历史长河中，在清代，曾出现了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指出的：“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藉。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士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到了20世纪，对边疆的研究更展现出新的光彩。

中国边疆研究，主要以两条路径展开，其一为本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璨若群星，此处无须赘言；其二则是国外学者

的成果译介,在这方面,目前以对专门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居多,而理论建构方面的著作则相对缺乏。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是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史加以整体性解释的第一种主要模式,以“边疆形态”作为探究中国边疆史的切入点,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而在拉氏之后,托马斯·巴菲尔德的这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一书,实现了从拉氏“边疆形态”向“内部/外部边界战略”解释模式的转变,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近几年,边疆史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无疑会令研治边疆史的学者们感到欣慰,但是,在这种热潮涌动之下,有着诸多的浮光掠影、人云亦云,如何真正深入体验边疆的内在意义,并激发出更多的问题意识,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而怎样“进入”边疆,这成为解决上述难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仅要在材料发掘上有新的进展,同时也需要在视角和观念认识上加以转化与提升,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言:“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和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新版自序,第3页)

秉持“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观念,作为译者,我也希望,巴菲尔德教授这部名著的翻译和出版能够为我们思考边疆和民族问题提

供一种参照,但更远的目的,则是让我们对自己的边疆观念有新的反思性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并建设我们共同的祖国。

袁 剑

2011年4月1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代中译本前言

中国作为一个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传统多族群国家,其边疆史有着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一方面体现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总是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以中原文化观观照中国边疆史,但在另一方面,正如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这反映到中国边疆史上则又表现出某种“复合性”。这种融汇“主体性”与“复合性”的“边疆记忆”在中国自身的文本表述中有着特有的记录方式与表述传统,而与西欧、美国甚至俄国的边疆历史发展史存在着结构性的区别。近代以来,出于“以史为鉴”与“经世致用”的考虑,中国学者对边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大批边疆研究著述问世,如葛綏成的《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1944),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等著作分别从各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治军事行动与边疆政策加以论述,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分别叙述各个朝代

的政治、军事、族群政策并加以罗列,再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史。这种叙述模式从材料搜集与运用的角度而言,意义不言而喻,但是从整体角度概观,则会发现逻辑说明力显得较弱,“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文汇报》,2007年5月25日)。在传统观念中,“地域的边界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然而一个人对自己是‘非’外国人的感觉常常建立在对自己领土‘之外’的地方所形成的很不严格的概念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一股脑儿地堆到了自己领土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8页)。而中原王朝的边疆行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边疆互动又是如何生发的?如何量度这种边疆互动?游牧政权是否有其习惯性的边疆政治思路?这些都是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所经常缺失的“复合性”的问题,而这在“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中无法做出清晰的解答,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寻找解答的工具,以另外的视野观照中国边疆问题。当史籍材料无法形成有效的解释体系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非历史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使我们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域。近年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日渐活跃,西文著述的中译亦如火如荼,但其间各专业的情况大不相同。作为目前整个人文学界相对冷寂的边疆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问题的困扰,西文著述的译介显得较为乏力,长远而言,这种状况对学科之发展实属不利。在事实上,当我们尚满足于对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式观照时,彼岸的美国已有学者开始了人类学视域的探究,力图从游牧社

会来发现历史,找寻边疆史研究的“中国性”中一度缺失的“复合性”,其中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 Blackwell, 1989)一书受到关注。有国内学者认为此书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O. Lattimore)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

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考古学训练,并于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89年成为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大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进行研究。《危险的边疆》1989年由Blackwell出版集团出版之后,因学术界评价甚高,Blackwell遂于1992年再版发行。作者对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探究,并以社会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提出了新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西方学界亦有多篇书评加以评述。

此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国与这些帝国的关系做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指出,作为一直居处于汉族中原王朝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大多数时段内都控制着北方草原,并建立起强大帝国与中原王朝对峙,在成吉思汗时期,这种北方游牧力量达到极盛,不仅征服了中原的大片土地,而且横扫欧亚大陆,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技术与贸易方式的革新,北方游牧地区在世界政治及贸易中的战略位置开始下降,而且游牧地区与中原政权之间久已维持的军事平衡也逐渐破坏,最终,这块区域在俄国与清朝的帝国扩张中被一体化。但是在对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加以研究时,学界却始终缺乏一种合适的

分析框架对其历史发展做出清晰说明,即使是那些内陆亚洲问题的专门研究者们也经常对其历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茫然无措,他们往往忽视历史或社会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而局限于对历史文献或碑铭的转述、语言问题、艺术史以及对历史上部落的位置的确定等。作者认为在对内陆亚洲的研究中有必要对历史上和人类学视角下的一些更突出的问题加以探究。在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漫长的交流史中,北方的马背民族不仅拒斥汉族的文化与思想意识,而且除了汉族所提供的他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产品之外也抗拒汉族的其他产品,他们有着自己的游牧经济基础,对邻近政权的物质依赖性很小。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各自的角度而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但是在内陆亚洲的两者边界上,这两个社会彼此相互接触并对对方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前的人类学理论日益看重对作为社会间互动产物而非当地原产物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结构性发展的变化进行分析。孤立地看,内陆亚洲的政治变迁似乎是很随机性的,但是一旦将其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地域性背景中考虑时,就会发现它与中原王朝的集权化周期有着强烈的规则性关联。游牧民族与汉人在世界观念上的不同使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问题重重。草原社会的权力机制往往是英雄化并兼具卡理斯玛式的,而中原汉人社会的机制则更类似于体系化的官僚科层制,这些制度性差异使他们往往难以合理解释对方社会的兴盛变迁,双方经常处于彼此“误读”的状态之中。基于汉族既有的文化观念,中原王朝的学者们在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方面就更强调“华夷之辨”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现实的北方军事压力。而处于南北对峙的边疆民众则变得非常善于变通,他们往往接受汉族的外部形式而放弃其实质内容,正是这些边疆区的所谓“野蛮人”(barbarians)的存在,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大致得以固化。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统治者的观念亦是从其北方民族意识出发的,他们所率的蒙古铁骑在横扫欧亚大陆并客观上打破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固化界限而加速了民族交融之时,又以其观念误解

了中原内地的社会状况,差点将良田皆改作牧场。基于当时环境下的话语霸权,目前所遗留下的史料多为汉文史料,这些史料尤其是那些由儒家学者所编纂的中原王朝的官方叙述,总是以否定性的态度看待非汉族民众,故而,纯粹的中原视野不足以真实地发现两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以上的一些考虑,作者将内陆亚洲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史集中于五个基本问题并将之贯穿于全书的叙述分析之中:一、政治组织问题,即游牧社会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联合的地方性的社会政治组织的;二、互动的范围,即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与邻居尤其是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游牧力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强盛而在有些时段中又萎靡不振?三、中国的征服王朝:是否存在一个边疆关系周期能够解释那些发源于东北的民众所建立起的外族王朝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中统治着中国北方?四、蒙古世界征服者:蒙古帝国是草原政治发展的必然结局,还是对草原政治的一种偏离?五、游牧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否存在不同时段游牧社会间的显著差别以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的游牧社会做出合理区分?

在本书中,作者还专门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国北方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的更替过程。在大约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欧亚草原经历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之后两千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随着骑兵技术的使用,开始逐步侵入紧邻的农业国家,并最终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几乎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为什么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作者认为,仅仅将这些族群看成是野蛮人则大为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作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深知倚靠强大的中华帝国的必要性,故而往往确立一种“外部边界战略”(outer frontier strategy),其与汉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而非寄生关系。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经常彼此交错进入混乱无序状态,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

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在这些政权中,像辽、金朝内部还继续存在着南(汉人型)、北(本土型)政治体系的划分。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王朝的基本互动类型由秦汉一直持续到清朝,其间只有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打破了这种长久维持的中原与北方边地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到了清朝中叶攻灭准噶尔政权之后,传统的边疆关系开始向全球性的经贸关系转变。作者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们(不包括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族)在边疆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并未成为中国的征服者,而来自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部族们却由于其自身的政治与生态原因在中原王朝因内部叛乱而垮台之际得以在中原建立起国家政权。这也成为作者贯穿于全书的核心观念之一。

当然,作者作为人类学教授,并非关于内陆亚洲历史研究的专门家,也并不熟悉中文和其他内陆亚洲语言,这种研究领域及语言工具上的欠缺无疑会对研究产生障碍,并可能影响其论据及论证过程的准确程度。但是,作为历史学界之外的观察者,他对关于游牧帝国问题的某些基准性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他大量阅读杰出的研究著作,充分利用了人类学学者对游牧社会所特有的田野调查经验,较之专研某一问题的专门学者,展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并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门史学家的新思路。从专业历史学家的批判性眼光看来,他的此部著作缺少对于原始材料的运用,所附地图偏少,且在文末注释中也缺少某些必不可少的经典性书籍,如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草原帝国》等书,且其观念依旧保留着些许“中原中心”与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但就从作者提供的新的观察分析视角而言,本书试图避开中国边疆史中

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并找寻“复合性”的尝试,对于我们依旧有所助益。或许,只有从最纯粹专业的角度加以探究,才能在这一层面加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当我们在新的矿井中找到最璀璨的明钻时,或许会对周围矿井中遗漏的些许宝石抱宽容的态度。

(本文原载《读书》2009年第4期)

袁 剑

序 言

直到近代为止,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并侵入紧邻的定居文明。尽管他们人数不多,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甚粗陋,但这些游牧民族却对世界历史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在他们邻居的眼中,这些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和陌生人,但却充满力量、咄咄逼人。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解释这些社会的本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在眼前一闪而过,难以捉摸。

总的说来,这是由于内陆亚洲的游牧民众与他们的定居邻居在生活方式上大不相同所致。部落的政治结构以及以畜牧为生、草原游牧文化的机制并不像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邻居那样清晰可寻。虽然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汉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献记载,但他们很少用游牧民族自己的术语进行描述。当然,这些游牧民族有其自己的风俗。部落民众自身形成的一些铭文与文献使阅读者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草原生活及观念。

本书力图通过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那些紧邻中原北部边界的部落民众当中,对其可资利用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以揭示内陆亚洲的某些历史概况。这里所选取的是中国边疆,因为这里有着

最大和最复杂的游牧政权,诸如匈奴、突厥以及蒙古等。汉人对其北方邻居的历史记录也无比丰富。尽管本书着重利用了这些原始资料,但却力图以之确定在草原视角下的内陆亚洲与中原之间互动的范围。那些认为汉文史料对事件与政策的描述过于粗略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意识到,只有采取与那些将内陆亚洲寥寥几笔带过的中国研究的通常路径非常不同的方式,才能理解内陆亚洲人所面临的问题。与此类似,关于政治与经济组织的人类学模式也被运用到历史资料的分析中,以表现他们是如何使那些看似无休止的战争、帝国以及入侵变得清晰可解的,而这也避免了通常将内陆亚洲史作为主题的传统研究路径。

人类学家乐于提出总体模式,却忽略了细节。在本书中我试图证明互动模式能够被历史数据所检验,并以之解释特定时段中的主要变化。人类学关注事件,因为事件更为清晰地确定了这些互动规则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失效的。这些规则的运作构成了在超过两千年的历程中东亚草原部落边疆的总体历史,但这只是分析的副产品,绝不是一段完整的历史。例如,在可利用的二手文献中,对于内陆亚洲只是几笔带过,而较之在正史中经常可见的时期,一些更少知晓的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专家而言,问题是,所提出的假说能否经受更多细节性的检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主要的问题则是,在他们掩卷之际,能否形成关于内陆亚洲的清晰观念,即这是否有其自身不同文化特征的世界历史的一种动力。

我对游牧与定居民众之间关系的兴趣生发于对中亚的民族志研究。我在阿富汗北部的中亚阿拉伯游牧民中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他们每年从阿姆河的低地沼泽迁徙至巴达赫尚的高山牧场。为了专门为城市肉类市场饲养绵羊,他们放弃其游牧方式而完全融入了当地经济之中。他们的社会组织维持着一种修正了的锥形氏族世系模式,更多地具有中亚而非中东的特性。在对他们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我发现中亚的游牧部落发展出与其定居邻居截然不同的关系。虽然家庭生活与家畜繁育的

类型非常相似(其不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生态条件),但每个部落的政治组织、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以及集中化程度区别很大。较之外部关系,这些不同之处显得更少与内部发展相关。自从如今的游牧民完全被定居国家封闭之后,较之民族志,历史学更能在曾经统治内陆亚洲的游牧社会的广阔范围内探究这一问题。

在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之后,我进而发现,中华帝国的官修正史通常会包含对其边疆地区的外族民众的广泛叙述。由于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通常会成为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大问题,因此在具体措置方面会更为慎重。我不是一位汉学家,但是由于超过一个世纪的将这些外族民众的历史翻译为西方语言的传统,诸多研究著作有时候被嘲讽为“翻译出野蛮人”(translating the barbarians)。在几乎所有这些著作中,作者们的固有意图是要使这些记载能为那些并不直接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所利用,尽管在实践中只有很少的非汉学家意识到了这些内部所蕴含的深意。对一位关注边疆关系的人类学家来说,它们相当清晰地提供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发现的关于部落政治与经济的更为长时段的历史信息。然而,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语言学或地理学问题的探究也不够充分。为了避免作出轻易结论,书中所引用的译文已经被更多胜任的学者在基本准确度与变化上重新与原始资料做过比对,他们对名称与地点采用了统一转写体系。这里采用了双重引文,以使汉学家能更容易地核对原文。

我从事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小约瑟夫·弗莱彻教授(late Professor Joseph Fletcher)的鼓励,他是内陆亚洲史研究的泰斗,他自己的著作包含了众多跨文化方法。他对将人类学的深厚民族志传统运用到对那些文化、经济与社会组织尚未熟知的人群的历史研究中深有兴趣。作为一位更了解游牧迁徙而非历史资料的人类学家,我表现出些许恐慌,但是他指导我越过了众多致命的学术陷阱,并使我不再夸夸其谈。他在中亚史方面学识渊博,不管是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文献,都能信手拈来。而当